

台湾问题：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两难议题

林 冈*

(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030)

摘要：台湾问题是困扰中美关系的一大难题。美国基于维护台湾海峡两岸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利益考虑，试图对双方采取平衡交往的双轨政策。但这一政策却因美国国内不同利益团体的作用，选举周期的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和海峡两岸的政治角力，不时地受到冲击，发生周期性的变化。美国对华政策的周期摇摆性，不利于维持台海现状。1995-1996年的海峡危机和2003-2004年岛内公投、制宪、正名风潮，与美方未能妥善处理台湾这一难题，给台北发出错误信号就有很大关系。

关键词：美国对台政策；两岸关系；中美关系；台湾难题；战略模糊；战略清晰；中程协议

中图分类号：D8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07)01-0045-06

长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是困扰中美关系的一大难题(dilemma)。对华盛顿来说，这一难题在于其不能从美方的单方面利益出发，同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予以外交承认，而只能二者择其一。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时与台北保持实质但非官方的关系，坚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既定原则，与两岸平衡交往，对台海一旦发生战争时美方是否军事介入，采取“战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的政策。近年美国在处理台湾难题上的做法有了一些变化。如果说，克林顿总统在1998年有关“三不”的表态与中方对李登辉访美的强烈反弹有部分关联的话，那么，布什总统在2003年对台北领导人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示警，则是为了防止岛内以“公投”和“宪改工程”为着力点的“独立”势头的持续发烧。^[1]在华盛顿-北京-台北三方的既定关系框架中，台北本是最不重要的角色，但近年来却采取了“以小搏大”，力图改变现状的进攻谋略。台北的论述是，台湾无意改变现状；而所谓的现状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理应得到国际承认，并在“宪政”的意义上予以“正名”。台北企图通过“外交”突破和自我宣示摆脱一中框架约束的冒险举措，促使北京和华盛顿达成维护台海现状的默契。中方在福建沿海加强导弹部署，以此吓阻台独势头。美方则推行一项积极外交(aggressive diplomacy)策略，反对台湾片面推进法理独立。

本文从政策演变的历史角度，考察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台湾难题，并以此推论其对台政策的未来走向。美国对华对台政策的两难境地的根源何在？美国能否在台海事务中维持平衡交往和前后一致的政策？台海现状能否得到维系？美国对台海战争的可能反应，是否已由战略模糊转为战略清晰(strategic clarity)？以下将对这些问题予以回答。

一、台湾难题之由来

台湾问题始终困扰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在中美建交之初，美国“认知”(acknowledge)到中方有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既定立场，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 作者简介：林冈，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985工程”二期台湾研究创新基地成员。

在北京的压力下，美国与台湾断交，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并将军队撤离台湾。但美国又表明，台湾问题应该由海峡两岸和平解决；北京的任何非和平企图，均被视为对地区和平和美国国家利益的威胁。同时，美国又与台湾维持着名为民间，实为准官方的密切关系。

美国对华对台的双轨(dual track)政策，加上美国在是否协防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策略，对维系 1979 年以来海峡两岸之间的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现状(status quo)起了较大的作用。虽然《与台湾关系法》没有在法律上要求美国在台湾受到攻击时，出兵相助，但该法暗示如果北京企图诉诸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将采取相应的措施。^[2]换言之，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隶属于“和平解决”原则，原则高于政策。^[3]华盛顿并未将台湾问题简单地视为中国的内政问题。但美国的双轨政策和战略模糊策略，有其既定的弱点。如果北京诉诸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或者台北继续推行渐进的“法理台独”路线而最终跨越北京的红线，华盛顿将不得不在与中国兵戎相见和放弃台湾之间进行两难的抉择。

美国双轨政策所隐含的另一潜在问题是如何界定和维持现状。这样一个结果开放(open-ended)的问题，加上全球环境和两岸关系的改变，激发了美国内部的政策辩论和调整。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北京和台北都试图借助其与美国的关系，使两岸关系朝向对己方有利的方向演变。九十年代以来，台北要求美国支持其获得更大的外交空间，北京则要求美国不要插手台湾问题，同时希望美国支持中国的尽早统一。^[4]北京和台北对美国在台海问题上角色的不同期望，加上美国内部不同利益团体的价值偏好和战略考虑，致使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在对华对台问题上采取了一条矛盾和多变的政策。

二、美国的平衡交往政策？

台湾难题的存在，使美国无法对两岸维持一条前后一致、平衡交往(evenhanded)的政策。20 世纪 90 年代的上半期堪称中美建交以来美台关系的最佳时期。苏东政权相继垮台，一时间降低了中国对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战略重要性。80 年代期间海峡两岸的政治发展的不同路径，则使美国的舆论倾向有利台湾的方面倾斜。基于上述认知(perception)和争取选票的考虑，老布什政府大幅提升美台关系，支持台湾加入关税暨贸易总协议(GATT)，对台出售 150 架 F-16 战机，允许美国部长级的官员访问台湾。

美国的这一战略倾斜趋势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继续发展。克林顿在其第一任期内将外交政策隶属于内政问题之下，使国会议员得以支持行政当局的国内政策为条件，获得对台湾问题的操控权。在国会的压力下，白宫在 1994 年秋天宣布了一系列的对台政策调整，包括将台湾驻美机构“北美协调会”改为“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进一步放宽美台高层官员互访的限制，支持台湾参与不以国家资格为加入前提的国际组织。^[5]1995 年白宫鉴于国会压倒多数的意见，被迫决定接受李登辉对康奈尔大学的“私人”访问。

台北突破一个中国框架的“务实外交”，以李登辉访美达到高峰。但这同时也暴露了美国双轨政策的弱点，在 90 年代后半期诱发了另一轮的政策调整。虽然 1995-1996 年的台海危机，引起了一些美国人士对台湾安全的关心和同情，但危机也提醒华盛顿意识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持续中心地位(continuing centrality)^[6]以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经过台海危机后的激烈公共辩论和政策检视，克林顿总统在第二任期内采取了与中国全面交往(comprehensive engagement)的政策，寻求北京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上与美国的合作，以此取代对中国的对抗和遏制政策。在这一战略框架下，美国虽然口头宣称对台政策的延续性，但微妙地调整了其在台湾事务上的立场。华盛顿通过限制台湾领导人在美国的活动，对台北的“务实外交”泼了冷水。“副总统”连战于 1997 年初获得赴美过境签证的条件是，不得与美国官方人士会面及参加公共活动。李登辉于同年 9 月在前往中美洲途中过境夏威夷，也受到同样限制。而就在李出访前夕，时任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陆士达(Stanley Roth)公开宣称美国在 1995 年允许李登辉访美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对台北无异于当头棒喝。^[7]

三、克林顿的新思路

克林顿对北京和台北的新思路是基于以下一个假设：即美国的务实外交政策可以塑造中国的未来，使其演变成一个容易为西方社会所接纳的国家。这一假设，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圈内一些自由派人士的思维，他们相信中国正走向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8]克林顿在 1998 年夏天访问北京时曾断言，他相信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怀有在 21 世纪将中国带向民主社会的远见。他的这一判断也许是受到中方当年对中美两位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对话和辩论予以电视直播的决定的鼓励。值得回顾的是，克林顿恰恰是在这次中国之行中作出了有关美国“三不”政策的口头宣示。这一宣示自然受到北京的欢迎，同时引起了台北极大忧虑。

事实上，克林顿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并没什么特别之处。但他明言美方不支持台湾加入以国家身份为入会要求的国际组织，也就是“三不”中的第三个“不”，却是美国历任总统从未公开宣示的立场。正如上文指出的，1994 年美国“台湾政策检视”(Taiwan Policy Review)点明，美国应支持台湾参与不以国家身份为入会前提的国际组织。上述两项政策声明，未必互相冲突，但 1994 年的说法，对台湾也许较为顺耳，即使美国国务院并未对台湾参与非政府组织提供多大帮助。从台北的观点看来，克林顿有关“三不”的公开承诺，特别是第三个“不”，意味着世界头号大国的领导人已经明确地否认了台湾的所谓“国家”身份。

另一个改变的迹象是克林顿有关中国和平统一的评论。克林顿访华期间，于 6 月 29 日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到，中国的重新统一应当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美国鼓励两岸对话，以实现这一目标(“The reunification would occur by peaceful means, and we have encouraged the cross-Strait dialogue to achieve that”)。克林顿的这一说法与美国的既定政策有着微妙而显著的出入。美国的既定政策是，美方所关心的只是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而不管最终结果是统一还是“独立”。克林顿的评论自然引起了北京的兴奋和台北的焦虑，虽然双方都不十分确定克林顿只是不恰当地表达了个人的偏好，还是有意透露一项美国可以接受的政策方案(a policy option open to the United States)。即使是华府圈内的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家当年对克林顿的说法也有不同的解读。^[9]

不管怎么说，一个公认的变化是美国对两岸协商的态度由消极转为积极。1995-96 年台海危机后，台北不顾北京的反对，单方面寻求外交突破的做法引起了美国国会议员、政策制定者和分析者的担心。^[10]与美国在 80 年代对两岸协商采取“不介入、不鼓励、不调停”政策不同的是，克林顿在其第二任期内鼓励两岸通过政治谈判解决争端，包括妥善处理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美方对两岸政治对话的明显推动，始于“中程协议”之说。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的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出任该职前，在 1998 年 1 月间的一场闭门研讨会上提出，海峡两岸在最终开始正式谈判统一之前，可通过对话协商，先行签署类似“台湾不独立，大陆不用武，维持现状五十年不变”的一揽子中程协议。此后，美国政府一些官员，包括陆士达和时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张戴佑(Darryl Johnson)及在台协会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等人，也先后对中程协议之说予以呼应。美方的促谈举措，对台北构成了无形的压力。^[11]虽然美国的目标是在两岸间维持平衡，但克林顿后期的政策已明显地朝有利北京的方向倾斜。

四、小布什的政策回摆

小布什在执政之初，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对手，而非战略伙伴。从这一政策导向出发，美国将台湾视同传统盟友。2001 年 4 月中美撞机事件后，布什宣称美国将竭尽所能协防台湾，并对台湾提供了一份史无前例的军售清单。同年 5 月，美国卫生部长汤普逊(Tommy Thompson)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大会演讲时，首度表示美国政府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立场。

“9~11”后美国对华政策从“接触-遏制”(congagement)转为“接触”(engagement)，重新将中国视为战略合作者。中美两国在全球反恐和地区安全问题上增进合作，江泽民主席和布什总统在 2001 年 10 月，2002

年2月和10月举行了三次会面，使台北担心华盛顿可能为了北京而牺牲台湾。当时台湾政界和学界的一些人士频繁造访华盛顿，向美方提出上述疑问。

事实上，布什政府近年来与海峡两岸同步发展了更为密切的关系。2001年秋天陈水扁过境纽约和休斯顿，21位众议员到纽约与陈会餐，参、众两院多数党与少数党领袖等20位重量级议员以会面或电话方式对陈表达欢迎之意。2002年，台湾“国防部长”汤耀明和“第一夫人”吴淑珍先后访问美国，美台军事交流和政治接触明显提升。2003年11月初陈水扁过境纽约所得到的接待规格，更是美台断交以来最高的一次：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得以在美国境内对媒体发表评论。这意味着尽管陈水扁致力将台湾正式地从中国分离出去，并因此招致北京的强烈谴责，也未必会影响到美台关系。^[12]2005年布什访问日本时，有意对台湾的民主化予以高度评价，甚至要求中方以台湾的政治自由化为榜样。虽然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Powell）曾在2003年秋天和2004年秋天两次宣称，中美关系处于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好时期，但美台关系在同时期也得到了急速的提升，其密切程度较之90年代上半期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不同的只是，90年代上半期，美国在处理对华对台关系上是单向倾斜，而现在则是左右逢源，同时得利。

虽然布什政府试图在北京和台北之间维持平衡，鼓励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北京和台北对华盛顿的角色和真实意图却有着不同的考虑。台北担心和平解决只是和平统一同义语，因为北京断然无法接受台湾从祖国分离出去的事实。另一方面，北京也担心美国所说的和平解决隐含和平分离的玄机，因为台湾在短期内不想接受统一，而美国也不愿意强迫台北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岸重开对话的前提。由于北京强烈反对台湾的“法理独立”，台北拒绝在现有的条件下与大陆统一，维持现状看来是华盛顿的首选。但这一目标并不容易实现。

多年来，美国在应对两岸危机问题上采取了一条战略模糊的政策。这一政策的主要好处是可以根据到时的具体状况，再决定是否卷入战争。这些状况包括：（1）海峡两岸哪一方先动武，（2）战争早期阶段两岸的军力平衡，（3）国际社会对战争的反应，和（4）美国的全球战略。这一政策的不利方面有二。其一是华府可能不得不支持由台湾人决定的独立运动和战争，准备与中国交战。其二是华盛顿可能不得不接受北京对台湾迅速军事打击的战果，即使这场战争不是由台北单方面改变政治现状而挑起。由于华府对战争的可能反应是模糊的，这一政策也许将误导两岸一些对美方的因应之道有一厢情愿之嫌的人士。台湾的一些人士可能预期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保卫台湾，为此放胆追求台独。大陆的一些人士则可能预期美国终归不可能卷入两岸的一场真实战争，低估形势的严峻性。

美国这一战略模糊政策的理性考虑是，华盛顿可以向两岸传递不同的声音。对台北来说，美方的信息是台北不能指望美国的军事保护，即使战争不是因台湾推动“法理台独”而挑起。对北京来说，美方的信息是中方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时，必须做好与美军交战的准备，即使战争的原因是台湾的“法理独立”。美方通过外交的私下渠道，可以让两岸的决策者分别知晓这些不同的信息。尽管这些信息是互相矛盾的，支持战略模糊政策的理性假设是，两岸在进行有关战争的决策时，都必须考虑到最坏的可能性。^[13]

美国的双轨政策和战略模糊策略对维护台海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现状或许有益。只要北京不对台使用武力和台北不推动“法理独立”，华盛顿无须在与中方交战或放弃台湾之间进行不愉快的选择。但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究竟应如何界定和维持现状，却使美国难以在台湾问题上真正奉行不偏不倚、前后一致的政策。

五、从战略模糊到战略清晰？

台北从2003年以来强力推进“台独”运动，对美国的战略模糊政策构成严峻的挑战。李登辉当局推动台湾“暗独”方面的战略优先是取得外交突破，1995年的康奈尔之行是其高峰点。与此相反，陈水扁当局的冒险战略（pushing the envelop）主要围绕着“新宪”、“公投”、“正名”等议题而展开。台北寻求国际承认的成败与否有赖于美国的支持，但华盛顿是否可以有效地阻止台湾单方面自我宣示，改变“宪政”结构的举动却在未定之数。确实，在布什和陈水扁的第一任期内，存在着“台独”导致战争的现实危险性。自从布什的第

二任期以来，台独运动的势头才有所减缓。

台海局势的动荡不安促使华盛顿在危机应对上采取了一条趋向战略清晰的政策。所谓战略清晰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含义。

第一种含义是美国将竭尽所能协防台湾，即使战争是因“台独”运动而诱发，美国也不能袖手旁观。布什总统在2001年春天有关美国将尽力协防台湾的表示，就是一个典型的说法。在美国看来，这一政策可以有效阻吓北京对台用武，但也有可能鼓励台北试图突破一个中国的框架，最后导致中美兵戎相见。

第二种含义是美国明告台北，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不是一张空白支票。用何汉理(Harry Harding)的话来说，美国只应对台湾安全作出“有条件的承诺”(conditional commitment)。如果因为“台独”导致战争，美国没有必要插手。曾将台湾形容为中美关系间的“最大地雷”的美国副国务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也宣称，如果“台独”导致战争，美国没有义务协防台湾。这一战略清晰的好处是吓阻台北宣告“法理独立”，但由于台湾领导人已多次宣称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美方又担心这种战略清晰可能鼓励北京对台发动攻击。前在台协会主席卜睿哲便将“有条件承诺”界定为“政策清晰”(policy clarity)和“操作模糊”(operational ambiguity)，因为华盛顿很难定夺何为“台湾独立”，华盛顿有关“台独”的标准和北京和台北又有不同。^[14]只是由于两年来华盛顿更为担心台北单方面改变现状，“有条件承诺”在美国内部较其它政策选项更受欢迎。战略清晰，操作模糊，有条件承诺，以及对海峡两岸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举动施加外交压力，已成为华盛顿许多决策者和政策分析家的口头禅。最明显的是，布什总统在2005年6月8日接受福斯电视新闻网的采访时表示，如果北京单方面进攻台湾，美国将基于台湾关系法挺身而出；但如果台北单方面宣告“独立”，将打破美国对两岸的策略平衡点，影响到美国的最终决策结果。^[15]

不过，美国政策圈和学术界的一些人士对于全盘接受战略清晰的思路仍然有所保留。唐耐心(Nancy Tucker)在其新著《危险海峡》的最后一章提出，华盛顿在应对台海的潜在危机时，必须坚持其传统的战略模糊政策。^[16]她认为美国对危机的反应方式将取决于届时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台海两岸交战的具体情形等变量，决策者均不愿预先设定美方的应对方式，以免自缚手脚。美国国务院的一些人士也不愿就美国是否对因“台独”引起的两岸战争不予介入问题作出明确表态。^[17]2006年5月初美国前副国务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在国会作证时提到“台独”意味着战争和美国士兵的伤亡，其立意固然在于重申美国反对台独、防患于未然的立场，但也透露出即使两岸交战的原因是台湾片面宣告“法理独立”，也不能完全排除美国出兵可能性的玄机。如果美国对台湾安全只是作出有条件的承诺，“台独”和美国士兵的可能伤亡在逻辑上也就没什么必然关联了。

近年来美国对“台独”的态度从“不支持”到“反对”，除了加重对台示警的意味外，也含有与中方共同进行危机管理的考虑。美方一些人士认为，即使台湾当局通过“公投”、“制宪”、“正名”等手段实现了“法理独立”，中方也不必当真，只要国际社会不承认“台湾独立”，台北的单方面行为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现状。2005年初李侃如在美国《外交事务》撰文指出，如果北京以台湾领导人的口头宣示，作为台湾是否已经“独立”的标准，将使中方处于被动地位，因为台北已经多次进行这种表述。但如果以台湾是否得到国际承认，作为判断标准，则北京将笃定是赢家。^[18]鉴于中方反对台湾“法理独立”的明确立场，美方一些人士提出，如果台湾宣告“法理独立”，希望中方稍安勿躁，由美方迫使台北退回原点。但一些人又认为，美国明确反对“台独”的立场，有可能鼓励中方对台使用武力。可见，美方就在是否应该坚持战略清晰问题上，也是处于两难境地。

六、结论

台湾问题是困扰中美关系的一大难题。这一难题根源于美台在20世纪50和60年代期间的盟友关系，影响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双边关系。美国基于维护台湾海峡两岸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利益考虑，试图对双方采取平衡交往的双轨政策。但这一政策却因美国国内不同利益团体的作用，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和海峡两岸的政治角力，不时地受到冲击，发生周期性的变化。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的共同特点是在其入主白

宫之初，均采取了对台湾较为有利的倾斜政策，其后又意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改弦更张。1997年中美曾达成努力建立迈向新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2005年美方将中国视为现存国际关系的利益攸关方。用语虽然不同，含义则很类似，都是立意于重新界定中美关系，所择定的时机刚好又都是两位总统第二任期的第一年，意味着美国新上任的总统所面临的国内舆论和长远外交利益间存在着某种张力，其外交政策学习过程(learning process)往往跟中美关系的危机有着难解之缘。换言之，美国对华对台利益关系的轻重取舍，与其说是体现政党利益的分野，不如说是受到选举周期的影响。

美国对华政策的周期摇摆性，不利于维持台海现状。1995-96年的海峡危机和2003-04年岛内“公投”、“制宪”、“正名”风潮，与美方未能妥善处理台湾这一难题，有意或无意地给台北发出错误信号有很大关系。而台湾问题越是可能失控，两岸越是可能兵戎相见，美国就越有可能采取一条清晰的战略，对台湾安全予以有限而明确的承诺，以应对危机的发生。目前，美国政策圈对由战略模糊到战略清晰的转向，尚未形成共识。但从过去的经验看来，台海局势的持续紧张，将不断为战略清晰派提供政策转向的诱因。毕竟，台海现状与和平能否真正得到维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能否让“台独”基本教义派从根本上放弃背靠美日、对抗大陆的侥幸取胜心态。

(本研究得到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

注释:

- [1] “三不”指的是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以国家身份为入会资格的国际组织。
- [2] 美国参议员汤姆斯(Craig Thomas)2000年5月9日在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办的“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词。
- [3] 笔者在2000年秋面访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官员时，他曾提到美国奉行一个中国原则。但在笔者进一步询问后，马上纠正说，他的意思是一个中国政策。
- [4] 林冈、胡晓波，《中美关系和台湾因素》，《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1999年11月。
- [5] 《解释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Adjustments to U.S. Policy toward Taiwan Explained)，美国国务院《背景简报》(Background Briefing)，1994年9月7日。
- [6] 傅利门(Chas W.Freeman)，《防止台海战争》(Preventing War in the Taiwan Strait)，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Vol.77，No.4，July/August 1998，p.6。
- [7] 《世界日报》，1997年8月2日。
- [8] 翁松燃，《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The Taiwan Issue in U.S.-China Relations)，全美中国政治研究会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Associ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 &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共同举办的“世纪之交的中美关系”(U.S.-China Relation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98年5月21-22日，美国华盛顿。
- [9] 作者面访记录，1998年7月、10月，美国华盛顿。
- [10] 《世界日报》，1996年4月24日。
- [11] 详见林冈，《台湾政党光谱的变化与两岸关系的前景》，见林冈 & 陈卫星编，《台海两岸的发展前景》，香港亚洲科学出版社，2000年。
- [12] 苏珊劳伦斯(Susan Lawrence)，《美国与台湾：外交上的凯旋之旅》(United States-Taiwan: Diplomatic But Triumphant Progress)，《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2003年11月13日。
- [13][14] 作者面访记录，2005年8月，美国华盛顿。
- [15] 台湾《中国时报》，2005年6月10日。
- [16] Nancy Bernkopf Tucker，*Dangerous Strait: The U.S.-Taiwan-China Crisi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
- [17] 作者面访记录，2006年3月28日，美国华盛顿。
- [18] Kenneth Lieberthal，“Preventing a War Over Taiwan,” *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2005。

(英文摘要下转第65页)

荆》记者问，原载香港《紫荆》1991年6月号。

[22] 《人民日报》1991年6月8日。

[23] 李强：《评“国家统一纲领”》、杨建成：《浅议“国家统一纲领”》，载台湾研究会编：《九十年代之台湾》，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第133、139页。

[24] 林劲：《对1991年国民党大陆政策调整的初步分析》，载姜殿铭主编：《台湾一九九一》，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第47页。

[25][26][27][28] 姜殿铭等主编：《当代台湾大事典》，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752页、第777页、第811页、第815页。

“Constitutional One China” and the Mainland Policy of Taiwan Kuomintang Party

DU Li-fu

Abstract : “Constitutional One China” according to ROC Constitution 1947 refers to only one China in the world, i.e.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The Kuomintang (KMT) Party has been sticking to the stand of “Constitutional One China” since its retreat to Taiwan. After 4-time revisions of the “Temporary Provisions” and 7-time revisions and additions to ROC Constitution, the main standpoint as defined by the “Constitutional One China” remains unchanged, except for the addition of “One Country Two Areas” and some other elements.

Key Words : Taiwan , “ constitutional one China ” , mainland policy, one country two areas

(上接第50页)

The Taiwan Dilemma in U.S. China Policy

LIN Gang

Abstract: The Taiwan issue is a dilemma confronting Sino-U.S. relations. Based on its strategic preference to a status quo (neither unification nor independence and neither war nor peac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e United States attempts to maintain an evenhanded “dual track” policy toward Beijing and Taipei. This policy, however, entails periodical adjustments, due to American domestic interest conflict and electoral campaign,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reconfiguration, as well as the two sides’ competition over their influences on Washington. The changing equilibrium of U.S. policy favoring one side as opposed to the other over times has helped to produce an unstable cross-Taiwan Strait relationship. The 1995-96 strait crises, and the 2003-04 turmoil around the issues of public referenda,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and “name rectification” were to a great degree attributable to the U.S. mismanagement of the Taiwan dilemma by sending wrong messages to the island.

Key Words: U.S. China policy, cross-Taiwan strait relations, sino-U.S. relations, the Taiwan dilemma, strategic ambiguity, strategic clarity, interim agreement